

晋商

与

中国

近代金融



山西经济出版社

董继斌 景占魁 主编

1-832-15
D65

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

特邀顾问 隋运生

主 编 董继斌 景占魁

撰写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素梅 孙丽萍 孙晋浩 苑琳

高春平 景占魁 董继斌

山西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宏伟 张慧君

助理责编:刘晓宇

复 审:宋晋平

终 审:赵建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董继斌,景占魁主编.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7

ISBN 7-80636-619-9

I. 晋... II. ①董...②景... III. ①商人—研究—
山西省②商业史—研究—山西省 IV. F7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4955 号

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

董继斌 景占魁 主编

*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科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8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

ISBN 7-80636-619-9

F·578 定价: 22.00 元

前言

(一)

发迹于 15 世纪末的晋商,到 16 世纪 70 年代进入它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19 世纪 20 年代,山西票号诞生,晋商从商贸领域挺进金融领域,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到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晋商稳固地占据中国金融市场,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从 19 世纪 80 年代全国性金融风潮起到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随着票号的消亡,晋商也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由兴到盛,盛极而衰,晋商纵横捭阖,称雄华夏商界近 500 年,在中国商贸金融史上涂下重重的一笔!

19 世纪以前,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堪称世界经济的中心。繁荣发达的经济使封建皇权制得以巩固和延续。在西方产业革命先后开始、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 1700~1820 年的 120 年间,中

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由 23.1% 上升到 32.4%, GDP 年增长率是欧洲的 4 倍。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而且在增长幅度上,仍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西方世界处处涌动着产业革命的浪潮,世界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刻,古老的华夏大地回光返照,呈现一派“落日的辉煌”,但紧接着就走向黑暗,长夜无歌而一蹶不振。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清王朝的迅速瓦解,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

17 世纪中叶后,西方世界爆发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历史的车轮突然间加速前进。而处于全球变局中的中国,此时正陶醉在康乾盛世的古老文明之中。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封建统治者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封建君主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最终使中华民族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由世界经济中心沦为任人宰割的弱国。

广阔的中国市场和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使中国成为贪婪的西方列强的必夺之地。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清王朝毕竟抵挡不住先进大工业生产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两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夺走了中国市场,也夺去了中国人的尊严,使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社会中挣扎了近一个世纪。中国近代金融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下的中国近代金融,它不仅屈从于封建势力的统治和盘剥,而且受制于西方列强的挤压和掠夺。

中国近代金融是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外化,从金融组织到货币制度都标识出它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金融组织上,中国银行业起步很晚,如果将具备现代银行要素的票号作为中国早期的银行业,那么,它的诞生虽然比中国第一家以“银行”命名的金融机构——中国通商银行早 70 多年,也比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外国银

行——丽如银行早 20 多年,但是,它比西方的威尼斯银行晚了 240 多年,比世界上首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晚 120 多年。在货币制度和形态上,中国长期实行银两和制钱并用的复本位币制,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19 世纪中叶前,世界各国先后都放弃银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上只有中国、西班牙、墨西哥实行银本位制。本位币制直接影响到商品贸易,落后的本位币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落后的银本位制下,流通中的货币也十分混乱,有制钱、银两、自铸银元、外国银元,还有纸元(钞票),既有钱庄、银号发行的钱票、银票,又有清政府一度发行的官票和宝钞,以及在华外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1900 年起,又流通铜元。币制及货币发行的落后与混乱加上金融管理的无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19 世纪中叶震动全国的金融风潮。在近代,晋商作为兼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群体,面对如此芜杂的金融环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恶劣社会环境,能够顽强生存还有所发展,甚至将 500 年晋商的辉煌发挥到极致,简直匪夷所思。

(二)

“大清帝国”在嘉庆以后就渐显衰象,到道光年间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便江河日下,气数殆尽。

然而,晋商这支活跃于明清两代的强劲商旅却没有因为清政府的衰微而一蹶不振,反而在道光初年创建了票号,并在此后的七八十年间,奇迹般地创建出晋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鼎盛时期。

票号诞生后,特别到咸丰以后,晋商(贸易商和票商)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商路通达数万里,款项汇通天下。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彼得堡,东延东京、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到处都有晋商的踪迹。在国内,虽然外国银行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就已建立,且规模和覆盖面在不断扩展,但一直到 19 世纪六

七十年代,山西票号仍稳固地占据着中国金融市场。

晋商何以在国力衰败、兵荒马乱的年代,创造出如此奇迹呢?

第一,票号资本的二重性适应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票号资本是一种生息资本,生息资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封建性的高利贷,一种是现代银行资本。票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兼有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的两重性。作为高利贷资本,在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时,它不得不以现代金融的面目出现,非如此,不足以抗衡外资银行的挤压;而作为银行资本,在封建势力的氛围中它又不得不同时具备与其现代金融本质相反的特质。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山西票号在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内,在西方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穿梭运行,游刃有余。

第二,晋商与清廷之间非同一般的结托关系。晋商与官府之间的往来在明代就有。到了清代特别是票号诞生后,这种结托关系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票号以官府为后盾,信用虚增,官府以票号为附庸,聚敛财银。最后发展到票号只对官银和巨商开放,不与中小工商业业务往来,从而为其迅速衰落埋下伏笔。

第三,把握商机、充当清廷的财政工具。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苦难,却给商人带来一些机会。晋商凭借与清廷的关系,紧紧抓住鸦片战争、白莲教起义、义和团运动、捻军起义出现的商机,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饷、协饷,筹措汇兑抵还不平等条约形成的对外赔款,还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俨然一副清廷总出纳的模样,其间晋商所得利益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严谨的经营作风和引进、创新的金融制度。晋商素以进取、敬业、谋略、商德而著称,明清几百年商海搏杀和经营作风的积淀,使晋商能够积财如山而崇尚节俭,大难临头而处变不惊,靠严谨的经营作风和不违封建伦理的商德商誉在动乱的清朝中晚期创造出商界奇迹。在金融制度上,或是引进或是创新,山西票商具有

了现代金融的雏形,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积金制度,风险防范金的提留、转账和异地结算、票据和贴现,汇票的防伪以及劳力和智力资本的入股等在当时都具有超前意识。所有这些不仅是它在战乱中得以生存发展的内在基础,而且使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

在中国商界独领风骚近 500 年的晋商,到 19 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走向衰落。此后的 40 年间,地盘日渐萎缩,经营日渐艰难,最终山穷水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晋商的衰落,既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也受制于自身的诸多局限。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其一,国势衰微,百业凋敝。清王朝的迅速垮台,使晋商尤其是票号业受到沉重打击。晋商长期与清廷结托,致使票号中大量存放官银,在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官员,对票号“存款立提,毫不通融;放款不还,人去楼空”,山西票号因此而倒闭者,十有七八。其二,清廷官银钱局及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的相继成立,在业务上夺走了票号的地盘,加上外资银行的挤压,使山西票号在内外夹击中日趋萎缩。其三,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使票号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局限性,在与资本主义银行的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其四,晋商作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运营者,在剩余资本的投向上始终存在战略性失策。晋商的资本积累大都用在购田置地,修建庄园,捐输助饷,结托官府,剩余部分或则窖藏或则奢侈浪费。他们很少将资金积累转向产业资本,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晋商的发展背离了社会潮流,单一的资金投向失去了风险抵御能力,它的彻底消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四)

本书的着力点是探索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同时,对晋商的产生、发展与衰落也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在撰著过程中,参考和引证了不少学术界前辈和同仁的资料和观点,在这里,我和全体写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资料 and 水平所限,本书的缺点和失误在所难免,希望尊敬的读者不吝赐教。

董继斌

2002年5月于太原

目 录

第一章 晋商的崛起与发展 /1

第一节 晋商崛起的历史背景 /2

第二节 晋商及其经营特点 /13

第二章 中国近代金融业的雏形——账局与票号 /29

第一节 近代中国金融组织的历史沿革与基本状况 /30

第二节 晋商与账局 /40

第三节 晋商与票号 /49

第三章 票号制度 /63

第一节 票号组织方式 /64

第二节 员工的管理 /71

第三节 票号的经营与管理 /84

第四章 晋商在金融上的创新 /100

- 第一节 晋商实行的股份制 /101
- 第二节 两权分离制的建立 /110
- 第三节 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 /115
- 第四节 拓展金融业务的创举 /123

第五章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侵入 /129

- 第一节 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新特点 /130
- 第二节 外国金融机构在华的设立与扩张 /141
- 第三节 清政府在金融上的举措与对外借款 /151

第六章 票号在国家财政金融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71

- 第一节 票号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命运的改变 /172
- 第二节 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加深 /182
- 第三节 票号与封建官僚的相互支持 /201
- 第四节 票号充当了清政府的财政金融工具 /212

第七章 票号在内外夹击中的惨淡经营 /233

- 第一节 内外战争对票号的损害 /234
- 第二节 中外银行对票号的挤压 /249
- 第三节 恶劣的金融环境和形势对票号的影响 /267

第八章 票号在逆境中的顽强挣扎 /287

- 第一节 采取灵活手段,增加竞争能力 /288
- 第二节 改组银行的坎坷曲折 /294
- 第三节 凄风苦雨中的挣扎 /302

第九章 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中的作用和影响 /314

第一节 晋商促成了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形成 /315

第二节 票号在中国近代财政金融中的重要地位 /320

第三节 票号在清末民初中国金融业发展变化中的处境 /331

第十章 晋商衰落原因的历史反思 /347

第一节 国运日衰,山河破碎,使晋商陷入困境 /348

第二节 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使晋商失去竞争的物质基础 /355

第三节 晋商与清政府的结托,给自己种下了苦果 /363

第四节 晋商自身的局限,导致了它的衰落 /371

主要参考文献 /376

后 记 /381

第一章

晋商的崛起与发展

明朝中后期崛起并称雄于中国商界的晋商,进入近代以后,又以其票号闻名于世,在中国近代金融界一度独领风骚。

晋商的崛起与发展,既得势于天时、地利,又受益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活动场地和物质基础。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晋商的发展处于一种有利的社会环境之中。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大举进入的刺激,国内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又给晋商及其票号的活跃以不少契机。而随着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不少因人稠地窄而不得不舍本求末、外出经商的山西人,找到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他们的艰苦奋斗,坚毅顽强,及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所形成的为人处世、经商致富的理念,则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它自身及其经营上的一些特点和风格。

第一节

晋商崛起的历史背景

一、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晋商提供了活动场地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位于万里长城的内侧。它背靠蒙古大草原,北上出大同,经绥远、归化可达恰克图;南接中州河南,南下经开封可通岭南广东;西与一河之隔的陕西相连,经西安,沿河西走廊可达新疆、中亚。可以说位扼通衢,连南接北,承东启西,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并且,由于山西处于北方游牧经济文化和中原农耕经济文化的交错地带,又是自秦汉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不断发生民族冲突、动兵用武的主要战场,因此,它在经济文化交流和军事防御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宋代,山西即为边防,明初为防御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曾设九边,山西为九边之一。

自古以来,虽然民族矛盾时剧时缓,但是,中原汉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间的经济交往都从未中断。汉初,山西人已经与匈奴在长城脚下互市。北宋时,在并州还设有交易市场与夏、辽交易,官市以并州西边匝河(今兴长)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甘草……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①

明初,尽管边镇形势仍很紧张,但经与瓦剌首领谈判后,在边镇还是建立了不少交易市场。在山西大同方面就有喜峰口、黑峪关、张家口、得胜堡、杀胡口(即杀虎口)、新平堡、守口堡、水泉营等。蒙古以自己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

^① 康基田:《晋乘搜略》,卷20。

交易市场的开辟,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活动的场地。尤为重要的是,明朝政府所置九边,都驻有重兵,所需粮草等数量相当之巨。如九边之一的大同镇,东起天城(天镇)抵宣府,西界阳河县,至井坪,边长320多公里,城堡、敌台、墩台达近千处,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有马、骡、驴5万多匹,“原额屯粮513 904石,草169 190束,秋青草176万束,民运山西米、麦、豆418 660石,草60万束,盐8万引”。^① 这么庞大的军需物资,无疑为山西商人提供了一个巨大商机。为了解决这些军需物资的来源与输送问题,明朝政府采取了屯田、民运等措施,但由于北部边镇都为高寒地带,产量相当有限,难以供给十几万兵马所需的大量粮食、布匹和其他物资,并且,在当时的交通颇为不便,运输手段主要又是靠肩挑背驮、牲畜运的情况下,要将数十万上百万石粮秣转运至千里之外的边镇,既增加了大量开支,又成了农民的一大沉重负担,因此,如何解决这一供需之间的矛盾,成了明朝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洪武三年(1370)六月,第一任山西行省参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建议: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陵县)长芦运到太和岭(今山西马邑),路远费重。如令商人于大同仓交米一石,太原仓交米一石三斗,发给淮盐一引,每引100公斤,商人纳米完毕,就可拿发给的盐引去指定的盐场领取食盐售卖,如此,既可以节省转运费用,又能减免百姓负担,解决边储。朱元璋见此法利国、便民,又可使商人赚钱,当即下旨准奏,“帝从之,请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招商中盐,以备边储”。^② “开中法”的推行,使已在边镇经商的众多山西人,更放开了手脚,他们利用近靠边防、运输便利的优势,捷足先登。这中间,不少徽商、鲁商也挟资

① 《大明会典》,卷28,《边粮》;卷130,《兵部》。

② 《明会要》,《食货志·盐法》。

北上,开赴九边,使中原与南方物资源源北运。边市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激起了晋商的热情,他们为了降低纳粮成本,有的就在边境招民垦荒种地,如雁门关外诸县就有这种“商屯”,从中获得中盐粮草,实际上他们成了盐商兼粮商。除晋北外,商屯还在东北等地进行。“迨时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耕者数千万。商人拿出财力,募民垦田”。^①为了更多地中盐获利,商人在边塞争购粮食,甚至购买青苗,或向当地土著之人提供借贷资金。许多山西商人通过贩盐贩粮,不但逐渐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而且又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明弘治五年(1492),朝廷改纳粮草马匹为直接向盐运司纳银领引后,商人们即把目光盯向了南方,活跃于山西解州、长芦、安徽、四川等地的盐场。居天下盐赋之半的淮南,“岁额百三十万引。向来山西、徽州之富人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扬州是淮盐集散中心,山西太原的阎家、李家,河津县的刘家,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临汾的亢家,均在扬州盐市称雄。于是,山西商人在处于垄断全国各省盐商地位的同时,边远省份也以山西盐商领先。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改引为纲后,这批盐商又获得收购、运销食盐的世袭经营特权。因此,可以说,是地处边镇的有利地位和“开中法”的实施,才使晋商得以迅速崛起。明永乐以后,社会政局安定,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商业资本空前活跃起来,于是,出现了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江右商、吴越商等许多商帮。而晋商已开始称雄天下。就其资本而言,“平阳、泽、潞富家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在活动范围上,到明末,晋商已进入东北,并且进行着频繁的贸易活动,成为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政权发展东北地区经济和边境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

入清以后,随着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中原地区与蒙古地区的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40。

② 谢肇淛:《五杂俎》。

贸易较前更为发展。山西由于地处这两个地区的接壤之处,之前就已经开辟出了几条通经蒙古的商路,因此,它又成了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山西商人因势得便,把闽、粤和江、淮流域的各种物资,经水路分别集聚到汉口、周口,之后经开封、怀庆府(沁阳)、泽州、潞安、子洪运抵太谷、祁县,经过加工分包,再继续北运,沿着旧日的军事道路雁北山区,经忻州、原平,出雁门关,至山阴县黄花梁分道,一路去东口(张家口),一路走西口(归化城)。从西口进入蒙古的物资,可由归化——包头——宁夏——兰州——敦煌到叶尔羌,或由归化——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到塔尔巴哈台;往东则经张家口——多伦——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再经北是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茫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到彼得堡,进入欧洲市场。这条商路在山西的长城线上与明代已经形成的北京——张家口——大同——杀胡口——榆林——凉州——甘州——嘉峪关的东西商路相交叉,同时又位于形成于汉朝、成熟于隋唐的丝绸之路的东端延长线西安——潼关——太原——北京。^① 晋商正是凭借山西地理位置上的这一优势,而将其触角伸向内地和蒙古、东北以至国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山西为基地的商业网。

二、山西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发达的手工业为晋商提供了物质基础

山西煤、铁、盐等矿产资源相当丰富,农林牧业资源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且有着一定的规模。如采煤业,到19世纪初,作为山西主要煤炭生产区之一的晋中平定县,其境内煤窑已经星罗棋布,生产有了相当的规

^① 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见江地主编《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